



20世纪大审判



《二十世纪警世录》丛书

主编：严硕勤 黄道京



前 言

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正义与邪恶的抗争。正义的力量推动着人类向前发展，邪恶的力量阻止着历史前进的巨轮。西方人说：**A wicked man is his own hell**（坏人作恶，自造地狱）。中国人说：“多行不义必自毙。”正义的力量终将战胜邪恶的势力，这是人间之公理。法律是人类行为规范的准绳。自从人类制定了法律，也就有了审判。20 世纪的人类仍然沿用这一方式来判明人间的大是大非，扬正抑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告诉人们：正义终将压倒邪恶，谁也阻挡不住滚滚前进的历史巨轮。

本书介绍了本世纪以来几个最著名的震惊人寰的大审判，其中有审判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贩子的纽伦堡大审判、东京大审判；有审判世界上最大的黑社会组织——“黑手党”头目的美国黑手党世纪性大审判、意大利黑手党大审判；有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大审判——林彪、江青集团案大审判；也有 30 年代苏联共产党内部矛盾造成的令人惋惜的大审判——莫斯科大审判以及其它大审判。本书尊重史实，注重知识性和记实性，向读者披露了这些大审判的具体经过、社会背景和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秘闻。愿读者从中受到启迪和教益。

LIBRARY

目 录

一、30年代莫斯科大审判	(1)
一场恶梦	
党内的分歧	
基洛夫案——血雨腥风的开端	
莫斯科第一次大审判	
叶若夫与莫斯科第二次大审判	
“肃反”步伐加快	
莫斯科第三次大审判	
“绞肉机器”的下场	
这样的历史悲剧不能重演	
二、纽伦堡大审判	(14)
前言	
五千万亡灵的控诉	
罪戾昭然——历时近一年的法庭公审	
尼密吉达女神拔出利剑——法庭判决	
三、东京大审判	(23)
逮捕日本战犯	
审判——二十八个日本战犯	
最后的执行	
东京审判的继续——伯力审判	
——沈阳和太原审判	
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四、林彪、四人帮集团案审判纪实	(32)
庄严的宣告	
开庭第一天——人民的公诉	
林立果如何秉持空军指挥权	

诬告周恩来、邓小平
真审判还是假审判
谋刺毛泽东
批斗刘少奇
江青迫害文艺界名人
千钧一发的“上海武装叛乱”
江青在法庭上的表演
多行不义必自毙

五、意大利黑手党大审判..... (59)

法网恢恢
追根寻源
事出有因
纷纷落网
任重道远

六、美国“伊朗门”事件和诺思受审案..... (65)

一石激起千层浪
里根的苦衷和美对尼加拉瓜的政策
荆棘丛生的调查
里根弃车保将

七、美国黑手党世纪性大审判..... (77)

大洋彼岸毒瘤的传入
美国黑手党的发展
对黑手党的侦破
审判黑手党“老板”
前景未可料也

30 年代莫斯科大审判

一场恶梦

长期生活在前苏联、并亲身经历了苏联 30 年代肃反扩大化运动而被当作“帝国主义间谍分子”投进监狱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946 年毛泽东在延安会见她时曾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在她的《斯大林时代》一书中写道：“我想，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难以想像 1936-1938 年间在苏联发生的那些过火行为的全貌，不计其数的人，大约有几万人，被秘密逮捕，并且未经审判就被送到北部和远东的罪犯集中营。成千的人被枪决，他们的遭遇无人知晓。120 万即苏联半数以上的党员被清洗出党。”

斯大林死后，苏联开始重新审查这些案件。1956 年 2 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在过去的两年里，已有 7679 人被‘恢复名誉’。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死去……”在这场举世罕见的人间浩劫中，数百万的苏联人民蒙受了重大的冤屈。

1936 年 9 月，尼古拉·叶若夫接替 G·G·雅戈达担任苏联保安机关首脑（内务人民委员），使日益加剧的 30 年代的恐怖临近了高潮。1936-1938 年间苏联曾对三个所谓的重大反革命案进行了公开审判。

1936 年 8 月 19 日-24 日，公开审判了

所谓“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耶夫分子恐怖中心案”，被告共 16 人，他们是：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斯米尔诺夫，巴卡耶夫，捷尔-瓦加尼扬，姆拉奇科夫斯基，皮克尔，奥尔伯格，德列伊泽尔，戈尔茨曼，列因戈尔德，别尔曼-尤林，弗里茨·戴维（克鲁格利扬茨基），M·E·卢里耶和 N·卢里耶。审判后被告被全部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

1937 年 1 月 23 日-30 日，公开审判了所谓“反苏托派中心案”。被告是：皮达科夫，拉狄克，索科尔尼科夫，谢列勃里亚科夫，穆拉洛夫，利夫希茨，德罗勃尼斯，鲍古斯拉夫斯基，克尼亚谢夫，拉塔伊恰克，涅尔金，舍斯托夫，斯特罗伊洛夫，图罗克，赫拉斯，普申和阿尔诺尔德。在这 17 名被告中，除了阿尔诺尔德和斯特罗伊洛夫被分别判处了 10 年和 8 年监禁外，其他 15 人都被枪决。

1938 年 3 月 2 日-13 日，审判了所谓“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被告是：布哈林，李可夫，雅戈达，克利斯廷斯基，拉科夫斯基，罗津戈尔茨，伊凡诺夫，切尔诺夫，格林科，泽连斯基，别索洛夫，伊克拉莫夫，霍贾耶夫，沙兰戈维奇，祖巴列夫，布拉诺夫，列文，普列特涅夫，卡扎科夫，马克西莫夫-季科夫斯基和克柳奇科夫。这些被告中，除了普列特涅夫被判刑 25 年，拉科夫斯基和别索诺夫被判刑 15 年以外，

其余被告都被判了死刑。

这三次审判都是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主持的，当时的最高检察院检察长维辛斯基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苏联 30 年代的大清洗就像漫漫长夜中的一个可怕的梦幻，至今仍停留在人们心中，难以抹去。它的动机，它的具体过程，它的历史影响，就像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说的，“谁也不能够恰当地评断”。但是毋庸置疑，当时苏联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是产生这场悲剧的根源之一。20-30 年代的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共产党掌握政权的国家，是战胜资本主义国家联合武装干涉之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处在国际反共势力的重重围困之下的苏维埃政权，即要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又要时刻提防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颠覆和破坏，有人认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大清洗使斯大林清除了异己力量，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

党内的分歧

列宁病重期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是由斯大林、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三人主持的。列宁逝世后的一段时间，仍然是这“三驾马车”共同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虽然斯大林担任着总书记的职务，但政治局的全体委员包括托洛茨基、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都被称为“党的领袖们”，他们的名字按字母顺序排列，提到其中的一位时，往往是说“党的领袖之一”。

20 年代苏联高层领导内部发生了错综复杂的斗争，先是斯大林联合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接着 1925 年又开始了斯大林和布哈林联合反对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的斗争，1926 年至 1927 年又发生了斯大林和布哈林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联合反对派”的斗争。

由于权力之争以及理论思想问题上的分歧，列宁逝世后苏联高层领导集团内曾和斯

大林站在一起的人在 20 年代末已逐步对斯大林失去信心而开始反对斯大林，从而形成了以斯大林、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人为首的一派和以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为首的“反对派”。双方的矛盾到 30 年代后半期逐步扩大和激化。

党内“反对派”对斯大林政策日益感到失望的主要原因是斯大林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使用秘密警察压制 30 年代强大的反对派的共同斗争，以致苏联的保安机关不仅取得了党内的最高地位，而且开始把党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这使昔日曾与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中和在粉碎反对派中共同战斗过的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日益感到自己的不安全和受威胁。他们不满于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政策。虽然他们都曾经在原则上同意过强行集体化的方针，但是不少人很快就意识到这一计划的执行中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错误和过火行为。加速强制集体化使苏联在 1930 年陷入了农业的严重危机。这引起了苏联社会各个阶层，包括贫农的不满和抵触。著名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肖洛霍夫给斯大林写了两封信，信中详细讲述了苏联农村中发生的混乱情况并请求斯大林下令进行调查。他在信中说：“如果你认为我信里所写的种种情况值得引起中央的注意，我就请求你派一些真正的共产党员到维申斯卡亚来。这些共产党员要有足够的勇气，敢于揭露那些应当对搞垮该地集体化运动的行径负责的人，而不论他们有多高的地位；这些共产党员要不仅调查哪些人用严刑拷打和辱骂的办法对待集体农庄庄员，而且要调查是谁指使他们那么做的。”

斯大林的民族政策也使党的干部日益不满。1934 年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后，斯大林过多地使用中央权力从而限制了各加盟共和国的自主权。由于实行工业化使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族技术人员和官员移居到各个共和国，同当地的居民发生了许多矛盾。这些矛盾使得党内非俄罗斯族干部很烦恼和不

满。列宁的战友、乌克兰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跟随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及右倾分子的斯克雷普尼克因对斯大林的民族政策不满于1933年自杀，在当时引起了极大震动。

老布尔什维克和军队领导人对日益增长的斯大林个人崇拜和独裁感到担忧，他们对斯大林在国内战争和红军建军中的作用的夸大也极为不满。

基洛夫案 ——血雨腥风的开端

1934年12月1日，拉开了苏联30年代大清洗的序幕。这一天，基洛夫在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被人暗杀。夺走他生命的枪声，触发了苏联历史上最血腥的清洗。

基洛夫1904年入党，十月革命中参与组织、领导工作，后来担任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他年轻有为，在党内外享有很高声誉。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成员时，据说他得的选票最多。有人称他为“温和派”，因为他主张实行一种较为灵活的政策，对过去的反对派实行和解，也反对独断专行。基洛夫谋杀案至今仍然是个谜。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对基洛夫谋杀案说道：引起注意的是谋刺者曾两次在斯莫尔尼宫附近被契卡（即内务部门）拘捕过，而且都发现他带有枪支。但因某人的指示，两次都被释放了。不知为什么在基洛夫遇害时，他的警卫队长远远落在后边，这是违反规定的。后来警卫队长被带去审问时，他应该由斯大林、莫洛托夫亲自审问，然而正如驾驶这辆车的司机后来说的那样，提押他的人员在路上有意制造事故，然后宣布警卫队长死于车祸，实际上是他们打死了他。在基洛夫被杀的当天晚上，按照斯大林的要求，没有经过政治局的批准（对政治局委员们只是事后两天才随便地通知了一

声），就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秘书阿别尔·叶努基泽签发了以下的指示：1、各司法机关应加速审理被控告犯有策划或采取恐怖行动的罪行的犯人。2、各级法院不得以为有赦免的可能而推迟执行对这类犯人所判的死刑。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不会考虑这类犯人要求赦免的申请。3、内务人民委员部应在这类罪犯被判处死刑后立即予以执行。

这样一来，任何“政治案件”都可以被称为“恐怖活动的准备”，从而大开杀戒。侦察过程缩短为10天，这就大大妨碍了对案件的调查、审理工作，而一经判决又不得上诉，并且立即执行。可以说，这是通过“法制”形式来为大规模制造冤假错案大开方便之门。

苏联在基洛夫遇害后所实行的特殊法律，被称作“基洛夫法”，在实行这种法律时，保安机关在抓人时根本不需要为证据或指控内容而费心，他们清楚地知道，通过某种方式便可弄到“恰如其分”的定罪材料。当局让审查官们相信他们的做法并不是非法行为。斯大林手下“功勋卓著”的总检察长维辛斯基在1937年3月的一次检察工作会议上就直接了当地说：“大家应该记住斯大林的话：在一个社会的生活中，在我们自己的一生中，总有这样的时刻，即法律成为过时的东西并应当撤到一边。”他还从学术上论证了一个前提，即在反国家的罪行中，被告的口供是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证据。正因为如此，内务人民委员部才不惜一切手段地逼取“口供”。

在“基洛夫法”的程序规则中清洗名单是逮捕人的重要依据。保安机关要负责提出“可疑分子”的名单，并按照一定的标准把他们加以分类。据苏共二十大公布的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名单都经过斯大林的亲自过目，由他或者他最亲密的同事，例如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或者伏罗希洛夫来操持名单上人的生死大权。赫鲁晓夫

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上说,1937-1938年间斯大林看过的这种名单有383份,上面有几千人的姓名。

在实行“基洛夫法”的过程中,许多人是在遭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严刑拷打之后不得不在预先编造好的口供上签名。列宁当年的一位同志鲁祖塔克亲身经历了这样的遭遇后,在写给中央的一封信里说:“现在这样的审查程序迫使被告说假话,不仅给自己编造罪名,而且还给别的无辜的人编造罪名。”

另一位传奇式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埃赫在受审判时曾宣告:

在我身上逼出来的所谓我的口供中,除了我的签名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字是我写的。审查官在我被捕后就开始拷打我,在他们的压力之下我开始编造了那些胡话。……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让法院、党和斯大林同志知道我是无罪的。

一位名叫罗津勃卢姆的老布尔什维克在斯大林死后说,他当年被逮捕后受到了可怕的刑讯,不得不同意在公审其他受害者时同审查员合作了。当时编造的一系列“反苏中心”和“反苏集团”的案子中为了诬陷和处决党的干部,被捕的犯人们曾被告之:“你们不必为任何事情担心,内务人民委员会设法迅速弄到有关这些反动组织的活动情况的详细证据的。”犯人如果同意“合作”,就会给他四五个月的时间来熟悉“证据”,预演他在即将举行的公审中所扮演的角色。审查官对犯人们说:“你们的命运取决于你们角色演得如何!”

在“基洛夫法”的影响下当时的苏共中央还实行了“株连九族”的残酷作法。“首犯”被捕后,其亲属也往往因“参与”了反革命活动而遭逮捕。布赫留尔元帅(1924-1927年曾被苏共派遣到中国担任孙中山广州革命政府首席军事顾问,化名为“加仑”)被捕后,他的兄弟柏维尔和他的第一个妻子加林娜·帕

夫洛夫也相继被捕。

莫斯科第一次大审判

大规模的清洗,一个接一个的公开或秘密的“反革命案”的审判于1936年8月拉开了序幕。

1936年8月15日,苏联各报都登载了苏联检察院关于重新审理基洛夫谋杀案有关人员的通报。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等人不再是仅仅对谋害基洛夫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而且被控直接组织了这次谋杀活动和企图暗杀包括斯大林、莫洛托夫在内的其他领导人。这离他们第一次受审不过两年时间,事情如此急转直下,令人大吃一惊。通报还说,他们在受审过程中都已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并且还作了“补充交待”,供出他们和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拉狄克等一大批人的“罪恶关系”。接着报纸上发表了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的命令,宣布开始对这些与阴谋案件有关的人员进行侦察。这以后的报纸上又连篇累牍地报道各地方人民纷纷举行集会,要求“彻底查清布哈林等人和这些恐怖分子之间的关系”。

主持1936年8月被称作“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耶夫分子恐怖中心案件”审判工作的是人民内务委员,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雅戈达。审查人员受命逮捕了许多与“案件”有牵连的干部、经过反复预审,其中许多人在遭受严刑折磨后被迫同意“合作”。

8月19日开始了“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耶夫分子恐怖中心案件”的公审。这是苏联30年代“肃反运动”的第一次公开大审判。被准许旁听的有苏联记者和外国记者,外交使团以及苏联企业界和政府部门的代表。但企业界和政府部门的代表不时地更换。

被告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等人被带到审判庭,他们看上去并没有受过拷打的痕迹,显得比较镇定,但有些神

情黯然。

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都是和斯大林同样资深的老布尔什维克领导者，杰出的理论家，列宁的老战友和亲密的朋友。列宁病重和逝世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和斯大林共同组成了主持党的工作的“三驾马车”。而此刻他们却成了反革命分子站在苏联最高法院的被告席上！

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向法官、听众和全世界交了自己的“罪行”：斯大林上台后他们失去了权力，于是就阴谋企图利用间谍谋杀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某些领导人来夺取政权。这些杀手是以德国盖世太保的普通间谍面目出现的。他们不知道谁是行动的指挥者。那时，谋杀成功后，行动的指挥者在名誉不受损伤的情况下，号召“党内团结”来应付紧急情况。在混乱之中，他们便可夺取政权。阴谋者们甚至已经商定，由一个名叫巴卡耶夫的人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他将动手把参与谋杀的间谍干掉，以便掩埋罪证。

在历时6天的公审中，被告交代了大量“罪行”，但看上去他们似乎神智不清，他们的“供词”有时像背诵经文一样流利，毫无停顿，有时却答非所问，有时则明显的自相矛盾。加米涅夫供认说，到1932年，他已清楚地看出人民已经接受了斯大林的政策，要通过政治手段把斯大林推翻是不可能了，因此只能使用“个人恐怖”。他说：“我们这样做是出于对斯大林的极度不满和对权力的强烈欲望，这种权力曾经一度已几乎落入我们手中。”季诺维耶夫也在法庭上宣称，他已习惯于对大批的人发号施令，以致不这样做他就活不下去。

被指控为这一案件的另一些同谋则供出了这个阴谋集团同盖世太保的联系。他们中间有一个自称为纳·吕里叶的人向法庭供认自己是“在希姆莱的私人代表弗朗斯·卫兹的领导下”工作。其他一些次要的“从犯”显然是在法庭上才知道他们行动的策划者为他

们安排的命运，这使他们在法庭上恶狠狠地攻击他们的指挥者。被告列因戈尔德向加米涅夫喊道：“不要让他装成这样清白的样子吧！他原来打算踏着堆积如山的尸体去夺取权力呐！”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最后审判：判处此案16名被告全部死刑，剥夺政治权力终身。判决立即执行。

虽然有些人认为这些审判是“假案”。但是列席法庭的大多数人，包括外国记者在内，却认为这是真实的。美国大使戴维斯在他的《莫斯科出使记》一书中写道，他相信被告的确是犯了被控告的罪行。太平洋学会秘书长爱德华·西·卡特也认为：“克里姆林宫的案件是……非常真实的。它是合乎逻辑的……令人信服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全面攻击30年代肃反运动时也没有说任何一件公开审判的案件是假案。

叶若夫与莫斯科 第二次大审判

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日丹诺夫联名给索契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以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发了一份电报，内容如下：

我们认为绝对迫切需要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雅戈达显然没有能力揭露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耶夫分子集团。国家政治保卫局在这件事情上至少落后了4年。所有党的干部和大多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都正在认识到这一点。

此后叶若夫取代雅戈达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他是按斯大林的意愿接替这一职务的，到职后叶若夫竭尽全力地效忠于斯大林，开始了苏联肃反运动最疯狂的时期。

其实在30年代初，在基洛夫遇暗杀之前，斯大林就已经感觉到“党内存在着大批异己分子和帝国主义间谍”，必须予以消

灭。因此在党内开始了审查旧党证和换发新党证的工作。这项清党工作由中央委员叶若夫负责。当时叶若夫和马林科夫曾跑到白俄罗斯地区去，认为那里存在一个以党政领导人为首的广泛的反苏地下组织。为此，白俄罗斯党组织内约有一半成员被剥夺了党证。又由于白俄罗斯人、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戈洛杰德在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对这种调查结果提出了怀疑，使共和国的领导干部遭到了更严厉的清洗。共和国几乎所有的领导人，包括中央委员会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各部人民委员、地方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人以及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代表，都被开除出党，许多人还被逮捕。

因为在党内清洗异己分子的工作中“功勋卓著”，叶若夫受到斯大林的赏识。1937年1月底，在距“莫斯科第一次大审判”还不到半年，叶若夫就不负斯大林重望成功地组织了“莫斯科第二次大审判”，这一次揪出了所谓“反苏托派中心案件”。这次公审从1937年1月23日开始到1月30日结束，被告有皮达科夫、拉狄克、索科利尼科夫等17名苏共著名领导人和活动家。这些人因拥戴过托洛茨基，曾被开除出党，但30年代初他们和托洛茨基断绝了关系，又恢复了党籍，并担任了领导职务。在这次审判中他们被指控参加反革命组织，策划间谍恐怖活动，并企图挑起德、日向苏联开战等等。

被告之一拉狄克，“莫斯科第一次大审判”之前在《消息报》任主编，他曾为“莫斯科第一次大审判”撰文写道：“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明白，现在党要用铁拳击溃这些残余匪帮，将他们粉碎、消灭，从地球上一扫而光！”而现在，他自己却成了“铁拳”击溃的对象了！

拉狄克博学多识、消息灵通，能仅凭记忆提供各国政党、历史事件的有关情况，被认为是国际关系方面的专家。1919年他曾提醒列宁不要进军波兰，他预言届时全体波兰人民都会奋起保卫祖国。事后列宁承认，

政治局犯了一个大错误，没有听从拉狄克的劝告。但列宁仍然认为他不宜担任重要的行政职务，认为他既无耐心，工作又无条理，而且口若悬河，中央委员会只能利用他做一个天才的记者。

在党内出现“左翼反对派”时，拉狄克站到了托洛茨基一边。1927年底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年半后，为了获得自由他不仅写了悔过书，还不得不担当抨击反对派的宣传工作。此后，拉狄克写了大量文章咒骂托洛茨基，成了斯大林的忠实助手。由于拉狄克的告密，内务部人员布留姆金和拉宾诺维奇被秘密处决，这使拉狄克把自己的命运同斯大林连在了一起。1933年拉狄克写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筑师》的小册子大肆吹捧斯大林，他也因此被任命为《消息报》主编和政治局对外关系顾问。

拉狄克被捕后愤怒得几乎发疯：“我为斯大林干了一切事情，可他却这样不讲信义！”他曾强烈要求跟斯大林面谈，却渺无回音。于是，拉狄克便竭力说服审判员，使他相信自己说成托洛茨基的同盟者于理不通。一种被欺侮的情感使这个意志薄弱的人强硬起来，居然顶住了审判员“连轴转”式的昼夜审讯。

内务部不得不动用索科利尼科夫来游说。索科利尼科夫是“第二次莫斯科大审判”中另一个重要的被告，曾任驻英国大使，列宁在世时就是中央委员。为了年轻的妻子和23岁的儿子，他早就屈服了。索科利尼科夫的谈话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拉狄克同意签写全部供词并以被告身份出庭，但他要求像索科利尼科夫一样见到斯大林。

在拉狄克按叶若夫的要求，写了包括所要求的全部供词的致斯大林的亲笔信，斯大林才在叶若夫的参与下与拉狄克作了一次长谈。随后，拉狄克在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审讯笔录上签字，甚至自己动手对笔录作了修改。几天后，拉狄克又主动作了补充，说他曾按托洛茨基的指示向一名德国外交官证

实，反苏地下组织授权托洛茨基以许诺领土为条件与德国政府谈判。这样，拉狄克成了叶若夫编造阴谋神话的私人顾问。

在法庭上，拉狄克成功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显得异常活跃，无论谈到什么都是那么诚挚，带着一种戏剧色彩。唯有宣判时，在一连串“死刑”判决之后，他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10年”，拉狄克向其他被告和观众露出了惭愧的微笑。

不过，拉狄克最后还是在监禁中死去。

这个“反苏托派中心案”的另一名主犯皮达科夫被捕前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皮达科夫是列宁在“遗嘱”中提到的6个苏共最著名的活动家之一。十月革命时他年仅27岁，从事革命工作却已有13年。他是乌克兰的第一任苏维埃主席，也是内战时期红军杰出的组织者之一，而他真正的才能突出表现在经济建设上。真正领导重工业，成为工业生产指挥灵魂的就是他。

皮达科夫20年代曾积极参加过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斯大林为了国家工业的发展和培养新干部等了8年才下令逮捕他。当时他的独生子才10岁。内务部首先制服了他的妻子，她深知在“莫斯科第一次大审判”时一些当事人的孩子是如何失踪的。她同意提供一切有关丈夫罪行的供词。皮达科夫本人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拒绝同审判长谈话。

皮达科夫是斯大林的好朋友、重工业人民委员会委员奥尔忠尼启则的副手，他们俩是很要好的朋友。皮达科夫被捕后，奥尔忠尼启则曾要求与皮达科夫单独谈谈。几天后，他又来到内务部与皮达科夫单独面谈。临走前，他当着皮达科夫的面通知内务部人员，斯大林已决定从受审人名单中去掉皮达科夫的妻子和秘书，他们也不作为证人出庭。显然皮达科夫已经同意以被告身份参加这次审判，当然是以奥尔忠尼启则不判他死刑的保证为前提的。皮达科夫便在一一切证词上签了字。

于是，根据这份已经修改的供词，法庭

宣布，皮达科夫在柏林出差时曾与在挪威的托洛茨基碰头，是1935年12月中旬乘坐德国人提供的专机在奥斯陆机场着陆入境的。

7月30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判：判处“反苏托派中心案”皮达科夫等14名被告死刑，立即执行。

三周以后报纸报道，奥尔忠尼启则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50岁。人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内务部的高级官员们却在私下里议论纷纷。外事管理局的副局长施必杰力克良斯说：“我知道这件事的一切细节。奥尔忠尼启则在他的住宅里流出了高加索的血——因为他与‘主人’（内务部人员对斯大林的称呼）吵翻了，强中自有强中手，这一切都是因为皮达科夫……”

“肃反”步伐加快

1937年2-3月的苏共中央全会又为肃反扩大化推波助澜。在这次全会上，斯大林提出了一个论点，即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阶级斗争会日益激化。他宣称党内仍有隐藏的日本、德国和托派奸细阴谋集团。莫洛托夫支持了这个说法，并特别批评了军队。叶若夫作了一个报告，题目是《日本、德国和托派代理人怠工、破坏和间谍活动的教训》。随后全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说到：

全会认为，在对反苏托派中心及其在各地的追随者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事实证明，在揭露这些人民死敌方面，内务部的工作落后于计划至少4年。

在这次全会上，除了已有的“破坏分子”、“代理人”、“判徒”这些字眼以外，又多了一个新的含混不清的词儿，即“两面派”，从此，在处决党的干部时，就常常使用这个字眼。

全会闭幕不久，内务部门开始加速行动，第一个打击的目标就是党的第十七次代

表大会（1934年召开）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结果，至1938年底，十七大当选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受到清洗，其中不少被枪决了。

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的党代表受到的打击最严重，70%被监禁或枪毙。

莫洛托夫在全会上对军队的指责是个讯号，它预示着在红军内大规模清洗的到来。莫洛托夫说军队不愿意同“人民公敌”作斗争。

不久内务部揭露了军队里存在的“反革命军事法西斯组织”，这个组织成员实际上就是红军的精华。他们包括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基辅军区司令基尔，俄罗斯军区司令乌鲍列维奇，以及担任过莫斯科军区司令的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科尔克。这些人有着卓越的领导经验和丰富的理论知识，经受过抗击国外力量干涉和白军进攻的考验，担负过组建苏联武装力量的重任。

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兼红军政治部主任加马尔尼克元帅被指控为“反革命军事法西斯组织”和“人民公敌”的组织者之一。他曾为领导和加强红军与红海军做出过巨大贡献。他因预料到自己将被逮捕审讯，于6月1日自杀。

1937年6月初，斯大林在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那次会议的单一议程就是揭露军队中的“反革命军事法西斯组织”。斯大林在这次和以后多次的讲话中，都谈到了伪造出来的那些原军队领导人的供词，要求彻底粉碎军队中那个实际并不存在的“阴谋”集团。这无疑是号召摧残军队干部。在那次军委会议上斯大林还毫无根据地指责了一些军事首长和政工干部，其中有总参谋部学院院长、原基辅军区参谋长库钦斯基，防空部部长谢佳金和列宁格勒军区政治部主任斯拉文。

这次会议以后，对军队里的军政干部的大规模迫害迅速加剧了。后果特别惨重的是国防人民委员部的总部机关，红军政治部，

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白俄罗斯军区，荣膺红旗勋章的远东特别集团军，波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各军事学院以及一些军、师部队。1937年8月，陆海军内的镇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1938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后局势有所缓和，但是镇压并没有停止，特别是对军队中政治工作干部的迫害，在1938年4月举行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通过了斯大林写的、题为《红军中党的政治工作的缺点和消除缺点的措施》的信。并把它作为一项指示性文件加以贯彻执行。这封信规定军内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把红军全军布尔什维克化”。

1937年12月被任命为红军政治部主任的麦赫利斯，利用他很高的地位，按照斯大林的指示迫害一切同“军内反对派集团”有过任何关系的人。可是这个集团在10年前就已经在思想上被粉碎了，并对党内或军队已无任何威胁。这个集团的所有领导人都已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努力工作，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军事政策，但是麦赫利斯却把一切曾多多少少同意过“军内反对派”观点的人都当作军内“白俄罗斯-托尔马切夫反党集团”的追随者。凡是被宣布为这个集团成员的政治工作人员都照例被开除党籍。在从陆海军铲除这个集团的借口之下，把许多在军政学院学习过的人及白俄罗斯、列宁格勒、基辅、哈尔科夫等军区的一些政工干部清除出军队。

1937-1938年，军队中数以千计的高级干部遭到了无端镇压。除了上述以外还有总参谋长叶戈罗夫，空军司令阿尔克斯尼斯，装甲兵司令哈列普斯基，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布留赫尔，总政治部副主任布林、奥谢皮扬，几乎所有各个军区的军事委员、政治部主任等高级将领，他们都是苏军最能干的一批干部。这一打击给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致使苏军在卫国战争初期严重失利。

1938年7月11日，军事法庭进行了一次秘密大审判，即对所谓“图哈切夫斯基案”的审判。法庭宣布：被告供认他们为希特勒所收买，答应帮助他夺取乌克兰。同被告图哈切夫斯基一起站在被告席上的有：埃德曼、费尔德曼、亚基尔、科尔克、普里马科夫、普特纳、乌鲍列维奇等苏军著名将领。他们全部被枪决。

“图哈切夫斯基案”在全军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图哈切夫斯基是苏军中享有很高声誉、功勋卓著的元帅。国内战争期间他为打败白军立下了汗马功劳。1921年被任命为红军军事学院院长，那时他才28岁。1922年调任西方面军司令，1924年任副参谋长，1925年任红军参谋长，1934年被选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任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获苏联元帅这一最高军衔。

1937年5月11日，图哈切夫斯基被免除副国防人民委员职务，任命为伏尔加军区司令。这时他已经意识到将有不正常的事情发生，但他想不出自己有什么过失和罪行，于是他努力保持镇定，到伏尔加军区任职。终于，5月27日他被开除军籍并遭逮捕。不久，他的妻子、母亲、姐妹以及两个兄弟都一起被押起来，之后他们被处死或流放。图哈切夫斯基在听了判决书以后说：“我觉得似乎是在做梦。”

亚基尔是基辅军区司令。曾三次荣膺红旗勋章和金剑。他曾一度受到斯大林的宠信。被捕后，他在写给斯大林的信中说：“我现在是而且多年来一直是忠诚于我们党和国家的一名正直军人。我整个的生命都是用来遵照党及其领导人的精神而无私地、诚实地工作……我说的每句话、每个字都是老老实实的，我死的时候还要高呼口号来表示我对您、对党、对我们国家的热爱，对共产主义的胜利充满了无限的信心。”

可是斯大林却在这封信上批了几个字：坏蛋、婊子！伏罗希洛夫补充说：完全正确。卡冈诺维奇则加上一句：对这种叛徒、

混帐东西的（这里用了一个粗俗不堪的字眼）唯一的惩罚就是处以死刑。

临刑前亚基尔还高呼：“党万岁！斯大林万岁！”他是这样相信党和斯大林，甚至都无法想象这种非法行为是蓄意采取的。他认为一定是有敌人钻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中。被处决的还有苏军著名理论家埃德曼，莫斯科军区司令科尔克，苏军驻英国武官普特纳等。

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但他女儿说：“俄罗斯民族却像磁铁般吸引着他，也许是他那深沉、粗犷的气质与俄罗斯民族性格更相和谐。”直至1930年召开的苏共十六大上，斯大林的民族政策仍然和列宁一致，他批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谴责主张使各民族语言“融合”和创造一种“全国”社会主义文化的论点。但是，1934年十七大以后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有了很大改变。他对各民族干部越来越不信任。由于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许多俄罗斯族人迁移到其它民族地区，因此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民族矛盾。在矛盾中，许多人被指责为“民族主义倾向分子”。1937年各加盟共和国纷纷揭露了各种“反革命案”，有“民族分裂案”、“判国间谍案”、“破坏经济建设案”等等。各民族中的大批精英被摧残。

1936年7月，贝利亚以“人民公敌”罪名干掉了亚美尼亚党的第一书记汉江。1937年7月，马林科夫又到亚美尼亚活动，逮捕了人民委员会主席。在没有任何说明，也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弄掉了两个最高领导人，并编造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指责在他们领导下的亚美尼亚有一个组织严密的“反革命民族主义集团”。就这样，根据马林科夫的指令，亚美尼亚大批无辜的人遭到严重迫害。一个月之内就有1000多人被捕。马林科夫还几次参加审问，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了社会主义法制准则。

阿塞拜疆党中央委员会负责人巴吉罗夫紧紧追随政治杀手贝利亚，在阿塞拜疆制造了一幕幕惨剧。在巴库市的一些区，几乎全

区党员、政工干部、经济干部都被告发，无一幸免。在巴吉罗夫的威胁和迫害下，著名学者古谢伊洛夫被迫自杀。唯一的罪名是他写了一本关于阿塞拜疆 19 世纪社会和哲学思想史的著作，而没有说明此书的作者是巴吉罗夫！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局照例批准成百份开除出党的党员名单，仅在常务局 1937 年 11 月 5 日的一次会议上，未经研究和辩论，就有 279 人被开除出党。前任政治保卫局局长里扎耶夫遭严刑拷打，始终不肯低头，最后被枪决了。

白俄罗斯共和国早在 1933 年就镇压了所谓“民族主义倾向分子”。大批的白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及农工协会、《竞赛》杂志领导人遭到残酷镇压。

哈萨克共和国受到的损害也很严重，从党的第一书记米尔佐扬和许多能干的高级干部到广大的知识分子、作家都遭到抵毁和镇压。

1936 年下半年对拉脱维亚共和国共产党员作了次大审查，结果许多忠诚的共产党员被开除出党，党员人数大大减少。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一度被解散，被一个机构——临时书记处所取代。

土库曼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及许多著名党和国家的活动家遭到了严厉打击，以至于 1937 年至 1938 年好几个月内中央委员会常务局瘫痪了。

乌克兰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及各州委几乎所有领导干部、国家和经济组织以及研究机构的领导成员都遭到了大小程度不同的迫害。在基辅，有个叫尼古拉延科的女人对乌克兰许多党政领导人散布了特别恶毒的诽谤，因此他们被开除党籍。但是斯大林在 1937 年苏共中央 2—3 月全会上，卡冈诺维奇在基辅州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却赞扬她是“英勇的揭发者”，指责乌克兰党中央和基辅州组织放松了政治警惕，为党的敌人充当了防空洞。

工业界大批干部及熟练的技术人员遭到

镇压，使苏联工业界遭受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几个部的人民委员（部长）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枪决，如国家计委主席麦日拉乌克，轻工业部人民委员柳比莫夫，食品工业部人民委员洛鲍夫，消费合作社中央联合会主席译连斯基，等等。1937 年，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开始断言，怠工遍及“我们全部或者几乎全部经济、行政和党组织”。大规模的镇压带来了极大的恐慌，阻碍了群众的主动精神和创造力的发挥。斯大林及其追随者常常不顾实际可能性，不合理地要求超额完成很高的工业建设指标，这就意味着对国家力量要求过高，许多具体计划不现实或不得当，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在遭到镇压的政府官员和经济管理人员中，人数最多的是“工业界领导人”。他们是一些努力工作、有能力的干部，曾帮助斯大林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处决的并不是沙皇俄国的遗老遗少们，而是属于革命后的新一代共产党人。据估计，中上层管理人员中，有 50% 至 75% 的人受到迫害，其中许多人被害死。当时不知出于什么考虑，集中力量镇压了对苏联政权影响最大的两个工业部门，即军事工业和化学工业。斯大林下令处决了一批很有魄力和才干的厂长、经理和科学家，使化工部门损失惨重。对军工界的清洗特别彻底，因为斯大林身边的人说军工部门内敌人成堆。负责军工生产的国家特别技术局局长齐夫齐瓦泽遭到了枪决。

机械工业部门也受到了很大的破坏。乌克兰哈尔科夫州的机械工业在全国占有很高的地位，哈尔科夫拖拉机厂、哈尔科夫机车厂都是苏联的标兵企业、模范工厂，这两个厂的厂长都是老布尔什维克。1937 年他们都遭到了无端镇压，州委第一书记与其他高级官员都被诬蔑为“同谋者”而被一起枪决。

工业界遭受的另一个重大损失是失去了大批年轻有为的骨干力量。他们在 1933 年或 1934 年才从工科大学毕业，成了工程师

或企业经理，正逐步成长为工业界新一代领导人。这批人受过高等教育，精通所选择的领域，不仅有理论知识，并且具备了当工段长、车间主任等的实际工作经验。这一损失是不可挽救的。

莫斯科第三次大审判

1938年3月，经过精心策划，“莫斯科第三次大审判”开庭了。被告布哈林、李可夫、雅戈达、克列斯廷斯基等20多人是在1937年已遭逮捕的。这次受审的布哈林、李可夫等都是列宁时期的老布尔什维克。布哈林在列宁的“遗嘱”中被称为“全党所喜爱的人物”、“党最可爱的和最伟大的理论家”；李可夫在列宁建立的第一届人民政府中就担任了内务人民委员，被捕前任全俄苏维埃主席以及好几个部人民委员。审判前，1938年2月已由检察院总长维辛斯基准备了一份很长的“公诉书”，控告布哈林等人有“叛国”、“破坏”、“谋杀”等罪名，提议交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判。

这个案件被称为“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

1938年3月2日开庭，维辛斯基仍是检察长，乌尔里赫担任审判长。坐在被告席上的有19人，雅戈达不久前还是“莫斯科第一次大审判”的组织者之一。被告中还有两名被控谋杀高尔基的医生。此案被告既有少数原来“右倾反对派”的成员，又有属于“左倾反对派”的成员，有的什么反对派也没参加过。参加旁听的有四五百名有组织的群众，大厅两旁还有为外国记者、外国人士设的专席。美驻苏大使戴维斯也列席旁听了。

布哈林、李可夫等人被指控为“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集团”的主要领导人，进行过长期的反革命活动。3月13日宣判结果，布哈林、李可夫等10余名被告均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苏联30年代大清洗期间，进行了三次公开大审判，有人称之为“橱窗式的审讯”。它们只是做做样子，让人看，显示其正常的“法律程序”，而成千上万的人则是遭到秘密逮捕和审讯，最终下落不明。

“绞肉机器”的下场

政治警察被用来对付异己力量，这在前苏联不是斯大林首先发明的。斯大林把它从俄国沙皇时代的“黑百团”那里继承过来并在20年代加以发展。1922年本来准备把政治警察下放给地方政府领导，斯大林却决定把它集中起来，作为一种控制工具。这种警察成了“国中之国”，它的任务就是发现“阴谋事件”。这种游离于国家法律之外的暴力工具给苏联人民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作为残害无辜的政治警察们最终也遭到了应有的下场。操纵“绞肉机”的雅戈达和叶若夫也都先后于1938年受到极刑！

作为残暴内幕的见证人，那些参加过莫斯科审判案的准备工作的审判员们也将被消灭，这也许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他们白天在工作岗位上，晚上在家中一批批遭到逮捕。谁也无法逃脱已经降临的厄运。其中有个以“虐待狂”著称的切尔斯克，在一大早前来逮捕他的特别行动队前高喊着：“你们不会抓到我！”从12层楼的窗口上跳了下去，摔得粉身碎骨。

1937年一年内，全国内务部机构有3000人被枪毙。内务部领导人中只有一人幸免，他就是政治保密局副局长留什科夫。他曾协助莫尔恰诺夫准备“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案”。由于跟叶若夫私交甚密，他保持自己的官位直到1938年。此后他被派往远东内务部主持工作。由于远东边防部队就在他的直接指挥之下，他于当年夏天成功地逃到日本。

从国外大批召回内务部情报人员，是在1937年夏天开始的。通常先以国内有家属

的人开始。奉召回国的人先由外事局局长斯卢茨基听取他们的汇报，然后被安排在南方专为高级干部开办的疗养院里休假一个月。他们在这里写信给那些留在国外的同事们，介绍他们在国内得到的优待，随后他们被告之将被派去另一个国家。可是当火车一开出莫斯科，他们的旅途就结束了。他们被带下火车，押往秘密监狱。

到1938年初，大部分驻外情报人员都被召回。斯卢茨基作为钓饵已失去了作用。2月17日，他被叫到叶若夫的一位名叫米海伊尔的助手的办公室里。半小时后，他的副手接到米海伊尔的电话：“请到我这儿来一下！”在那里，他首先看到他的上司无力地瘫坐在扶手椅上，面前的桌子上放着茶和点心。他立即意识到他的上司已经被害了，故意问道：“是否需要请医生？”“已经无法抢救了。他的心脏病又发作了。”米海伊尔漫不经心地暗示着。他任命那个副手接替斯卢茨基的工作，并向国外情报网通报：“斯大林的忠诚战士斯卢茨基以身殉职。”

国内战争结束后担任过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的列夫·费尔德宾，受政治局委派在西班牙任军事顾问，组织反间谍和敌后游击队的活动。1937年8月，他收到斯卢茨基的电报，说内务部决定派一个由12人组成的“私人卫队”去保护他以对付法西斯的阴谋绑架活动。这使他产生了怀疑，他表示断然拒绝，并自己挑选了10名久经考验、全副武装的共产党员组成卫队，与他形影不离。10月，斯卢茨基的一个副手，3个月前曾组织杀害拒绝回国的驻瑞士特派员的人，突然来到了西班牙，还会见了一个“恐怖行动小组”的领导人，这就更加深了列夫·费尔德宾的怀疑。他把自己的妻子女儿转移到了靠近西班牙的法国境内。1938年7月9日，叶若夫终于来电命令他到比利时，于7月12日登上停靠在那里的苏联轮船“斯维里”号。费尔德宾7月12日在法国国境上和自己的卫队告别后，没有到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却在

与妻子女儿会合后于7月13日清晨到达巴黎，并在当天离开了欧洲。

积极参与恐怖活动的克里姆林宫卫队长保克尔最终的结局也是因“帝国主义间谍罪”被处决！

保克尔是匈牙利人，曾在布达佩斯歌剧院当理发师兼做一位名角的仆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应召入伍，参加了奥匈帝国军队。1916年被俄军俘虏。十月革命爆发后在苏联入党，最初在肃反委员会工作。重操理发师旧艺使他成为肃反委员会二号首长缅任斯基的传令兵，他的发迹从此开始。

当上了克里姆林宫卫队长之后，保克尔掌握了政治局委员们的衣食住及用车、别野管理等大权，也掌握了他们私生活的细节。在赢得斯大林的欢心方面，他更是千方百计：他善于在餐桌上把斯大林逗得前仰后合；他为了改善斯大林的形象，为他定做了一双特号高跟鞋；他是第一个可以把剃刀放在领袖喉结的人。他成了斯大林的家庭成员。

那是在1927年，一天晚上，保克尔正陪着斯大林喝酒，外交人民委员部报告，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逮捕了中国共产党人，北京的中国当局还搜查了苏联大使馆。斯大林气愤至极，命令保克尔把在莫斯科的中国人统统抓起来。

保克尔连夜动员内务部一切能找到的人员，奔波了一整天。第二天一早，他向斯大林报告任务已经完成。早饭时，为了让斯大林快活一下，他模仿中国人的腔调，滑稽地表演了他们被捕时的恐惧形态。几个小时后，保克尔从睡梦中被电话唤醒。斯大林的秘书通知他，“主人”要他马上去，还提醒他“主人”正在发脾气。保克尔一走进斯大林的办公室，斯大林就问：“你把所有的中国人都逮捕了吗？”保克尔点头称是。

“那么共产国际里的那些中国人，还有中国留学生，你也把他们关起来了吗？”

“那当然，”保克尔得意地说，“我是一个

个把他们从床上拎起来的……”

“啪!”保克尔的话还没说完,脸上就重重地挨了一巴掌。

“笨蛋!”斯大林咆哮着:“立即把他们都放了!”

事后,保克尔回到内务部自己的办公室里,一直坐到深夜。他不知道该不该像往常一样回去陪伴斯大林。夜里1点,桌上克里姆林宫的直通电话响了,听筒里传出了斯大林平常那种温和的声音:“主人不明白,为什么保克尔没到他这儿来。”

保克尔放下听筒就向克里姆林宫跑去,斯大林的秘书在门口微笑着向他表示祝贺。保克尔莫名其妙:“这是怎么回事?”秘书答道:“到‘主人’那儿就知道了!”

在那里,斯大林把一个小盒子送到保克尔手里,里面放了一枚“红旗勋章”。苏共中央执委会颁发嘉奖令中指出,因为保克尔出色地完成了重要任务,决定对他进行嘉奖。

直到1937年夏,保克尔依然安然无恙。谁知不久,保克尔就被解职。当年年底,克里姆林宫全体警卫都换了人马。1938年3月,在“第三次莫斯科大审判”中保克尔被指控为德国间谍。也许,此时他早已不在人世了。

这样的历史悲剧不能重演

1933年12月,叶若夫被免去内务人民

委员职务,并被处决,由贝利亚接替了他的职务。贝利亚此后长期担任此职,利用“奉承拍马”和“绝对效忠”的本事受到斯大林的宠信,他继续伸出他的黑手迫害无辜的人民。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他也终于被苏联人民镇压了。

1939年后,虽然还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但已有所收敛,1937-1938年的高潮过去了。1936-1938年间,苏联难以计数的无辜人民从心灵到肉体上受到了极其残酷的迫害。这期间进行的三次所谓公开大审判是苏共历史上的大冤案,是个人集权政治的结果,它严重践踏了社会主义法律!

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开始正视历史,并提出为个人迷信时代惨遭迫害的党的干部和人民平反昭雪。赫鲁晓夫还建议在莫斯科立一座纪念碑来纪念斯大林时期的无辜受害者。但是平反的进程很慢,也很不深入。1987年12月,雷日科夫表示:苏共中央已成立专门机构,对30年代及以后的违法乱纪、武断专横的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根据前苏共中央1987年10月全会的决定,又将苏共二十大后开始的为斯大林时期无辜受害者恢复名誉的工作继续下去。